

引用格式:龙金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理论基础、符号标识与意义建构[J].探索,2024(3):37-49.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理论基础、 符号标识与意义建构

龙金菊

(铜仁学院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形象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内在体系,是主客体之间发生有效互动与联结的重要载体。形象分析是厘清各种关系图式分野、对人类所需的意义进行阐释的客观需要。关于形象的研究主要形成图像论、符号论与意识形态论三种理论取向,这些理论都突出了形象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是主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立足于形象的生成过程及其多层次转化机制,并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研究文献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亦是多层次不断发生互动与意义关联的动态发展过程。有必要从形象研究的理论谱系中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生成机制、符号标识与意义建构,进而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强有力的解释,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理论基础。在具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与叙事中,应依据历史记忆符号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源、依靠政治文化符号具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体、依托语言文字符号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意。有必要在整体性视角中兼顾历史性与现代性、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融通共同性与差异性、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多维互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对于提升国家形象、增进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文化符号

中图分类号: D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194(2024)03-0037-13

DOI:10.16501/j.cnki.50-1019/d.2024.03.012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不仅是新时代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必要之举,亦是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和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题中应有之义。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各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创新交融,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构建中华文化特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表达体系,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2]96}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往细里做,要有形、有感、有效。”^[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形象。”^{[4]45-46}从相关政策文本及其话语逻辑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主要涵盖于“中华文化符号”“中华民族形象”“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国家形象”的话语体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多元一体格局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研究”(21CMZ020),项目负责人:徐欣顺;贵州省理论创新课题铜仁学院专项联合课题“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紧密融合路径研究”(GZLCLHZX-2023-13),项目负责人:龙金菊;铜仁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民族互嵌的情感路径研究”(TRXYDH2010),项目负责人:龙金菊。

作者简介:龙金菊,女,博士,铜仁学院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教授。

系与意义旨向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一方面是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民族工作主线需要,以实现从“形象塑造”到“意识铸牢”之间的有效转化与内容衔接;另一方面是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高度凝练与概括,突出各民族共创共享中华文化并增进文化认同的根基性作用,亦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需要。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从既有研究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已成为当下的学术研究热点之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研究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一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整体性研究。有学者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既包括对共同体内在之意的认知理解与话语表达,也涵盖对共同体外在之象的感知评判与刻画形塑,是一种集意与形为一体的各种意念认知与意象表达的总和。”^[5]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首先要满足“互视共识”的要求,具体包括共同体结构互视、历史互视和内外互视,这是“共同体形象—共同塑造”的基本结构和过程,以彰显“世界公理”与“中国特色”这两个基本面向^[6]。在传播路径上,有学者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塑造,有‘入眼悦耳、身体力行、无象入心’三重境界”^[7]。在有效载体中,可以通过图像叙事^[8]、民族题材影视作品^[9]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

二是对中华民族视角形象的内涵解读。有学者将中华民族形象称为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或中华民族标识^[10]，“中华民族视觉形象是由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创、共享和共用的视觉形象构成的多元一体的视觉形象体系”^[11]。中华民族视角形象离不开历史上各民族丰富而复杂的形象元素,中国古代部落群体的形象在石器、岩画、青铜器等文化遗产中都有各种直观呈现。“随着接触点的增加,各族群在体质、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融合面扩大,逐渐深化文化认同并形成一些民族共同体式的视觉形象。”^[12]这些视角形象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角形象的重要文化基础。

三是紧扣“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政策话语的研究。比如对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概念内涵、划定原则及标准、主要类型及根本特点进行深入剖析^[13];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基本属性、时代价值与继承发展的基本路径进行分析^[14];探析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地方实践机制^[15]。

四是突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形象树立中的贡献。有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将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的理论与实践贯穿于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历程中,积淀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善于运用网络图文进行主流意识形态图像化建构^[16]，“形成了与时俱进的中华民族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价值诉求、政治整合和文化凝聚的互促互融实践逻辑”^[17]。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自身的国际形象建设,并积极进行对外传播,其良好形象也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18]。

可见,学者们都较为一致地肯定了中华民族形象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从多维视角描绘了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的方式方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研究开启了新的空间。然而,现有研究亦存在不足,主要体现为对形象的基础理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内涵界定及内在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转化机制探究不足。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基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础生成的,对其研究需要回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互

动关系之中,并充分体现“国家在场”的政治意义,最终使各民族都能自然而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因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研究,需要回溯形象研究的基本理论,并结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基础,兼顾时代话语体系建构的要求,才能形成强有力的解释。

二、理论阐释: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生成过程与基本要素

形象长久以来就是学术研究的热点,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深入挖掘形象理论的丰富内容,探究形象生成的一般规律,解析形象生成的基本过程、核心要素,能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提供重要理论支撑。

(一) 几种重要的形象理论

对形象的研究源于哲学领域对“思想”“观念”“精神”的思考,伴随“人与物”之间高度关联的内在结构及其互动机制展开。比如柏拉图的“洞穴”、亚里士多德的“蜡版”、洛克的“暗箱”、维特根斯坦的“象形文字”等^{[19]3},从精神、图画、感知与语言为人们提供思考各种形象的基本模式。我国古代也不乏关于形象的探讨,比如《周易·系辞》所说的“见乃谓之象”“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就展示了古人对“精神画面”的辩证思维。总体来看,学界关于形象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重要理论。

一是形象的图像论。这是一种基于光学与感知对形象的理论研究,主要代表人物为米歇尔。其著作《图像学: 形象, 文本, 意识形态》专门绘制了形象的家族谱系图。居于顶端的形象涵盖了下面并行的图像、视角、感知、精神与词语, 这些都可以视为广义的形象。米歇尔指出: “用‘形象’这个名称称呼所有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具有共性。最好是把形象看作一个跨越时空的、来自远方的家族, 在迁徙的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形。”^{[19]7} 米歇尔描述这样一幅图景: 左边是一根客观存在的蜡烛(真实物体), 右边是人的大脑(中介), 大脑中也有一根形状一样的由人脑所投射的蜡烛(投射物), 真实蜡烛与投射的蜡烛在人的瞳孔中实现了光学交汇。这一图景凸显了视角形象与物体之间的关系, 试图努力突破把精神形象与物质形象置于相同范畴的困境。然而, 这种精神形象或许是主观的, 可能会被抨击为不可知的形而上实体。米歇尔据此提出了语言形象的重要性, 认为语言是所有其他物质再现的“共同构成的公共表达”^{[19]20}。这也证实了形象的研究关乎思想、思维、意识生成、语义传播的关键过程。

二是形象的符号论。不管是在日常话语还是在理论构建中, 形象与符号都是紧密相连的, 形象的外显离不开符号的标识性作用。符号学的奠基者索绪尔指出: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门研究社会生活中符号生命的科学, 它将构成社会心理学的一部分, 因而也是普通心理学的一部分, 我们管它叫符号学。”^{[20]38} 由此开启了符号与形象研究的基本方向。哲学家卡西尔指出: “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的动物。”^{[21]45} 这意味着人是生活在一个对文化符号不断挑选、组合、转换的思维世界中, 人、符号与文化成了一种高度一体化的东西。各种文化现象都是以符号形式表示出来的人类经验。总体来看, 符号具有重要的物质性、意识性、元语言性、话语性等特征。 “这样一种理论的任务就是确保介于表达形式所传递的特定内容与外界的现实和实际状态之间的对应。”^{[22]60} 可见符号是形象建构过程中的重要载体。

三是形象的意识形态论。形象和特定利益需要与目标实现发生能动性的关联, 表现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诸多文本中揭露阶级矛盾时运用了富有象征意蕴的形

象工具,彰显了鲜明的形象思维,为形象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的欧洲一切实力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的同盟。”^{[23]399}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幽灵”隐喻共产主义思想和其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通过这种形象视角与心灵感通赋予了无产阶级强大的生命力,起到了强烈的震感与鼓动作用。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多次运用富有象征意蕴的词汇以强化唯物史观叙事的视觉形象。例如,在批判当时巴黎的戒严状况时写道“巴黎戒严是处于分娩共和国的产前阵痛中的制宪议会的助产婆。”^{[23]684-685} 此外还有诸如“刺刀”“马鞭”“弗利基亚帽”“死人铁面具”等彰显视觉形象的词汇,给人们提供有效的视觉空间,有力揭露了路易·波拿巴是如何借助对拿破仑的拙劣模仿来掩盖其倒行逆施的复辟勾当。这充分体现了形象的意识形态功能,为形象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成为本文的主要理论基础。

(二) 形象的生成转化机制

从形象理论谱系及其生成机制来看,形象是一个动态、可变的发展过程,是一种动态平衡的认知模式。综合相关的形象理论研究,笔者试图构建形象生成转化的理论模型,从四个级次揭示形象的生成过程与转化机制(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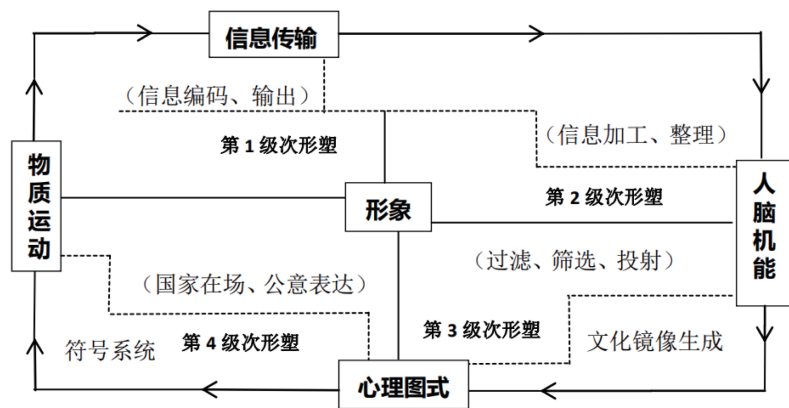


图1 形象生成转化的理论模型

形象的第一级次形塑。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在物质运动中,首先涉及大量的信息碰撞,这是事物本身的自由状态。然而这种状态在被意识到或关照到的时刻,其内涵并不是无限放大,而是根据自身内部结构、某种内在规律而得以被编码与传输。信息编码便是对事物内在结构与基本要素的破译,促使事物容易被理解与掌握。之后通过信息传输实现物质运动的第一次“到达”,也就是随机的、初步的事物接触。在信息编码、输出过程中自然就出现了物质形象的第一级次形塑。以民族形象为例,这一状态是某一民族群体存在的原初状态,是人类的物属依赖阶段,人们在特定地理空间、特定自然环境形成了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农耕民族、渔猎民族、游牧民族等原初形象便在那种自然依赖(或者说生存物依赖)中实现了农耕、渔猎、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信息编码与传播,初具区分性的结构与形象。

形象的第二级次形塑。这一阶段意味着事物开始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而这种辨识度是因为人脑的主观在场。当物质信息传达到人脑之后,物与人便产生了密切的关联。人脑机能自然会对所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加工、整理,通过特定的认知结构表达并外显出来,在此过程中就出现了

物质形象的第二级次形塑。以民族形象的识别度来说,就是研究术语中的“民族身份”。因为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与群体接触的扩大,人们根据不同群体的生存空间、生活状态、风俗特征等有了初步的身份认知,实现了对“我族”“你族”“他族”等不同民族身份的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就是民族形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比如提到某一民族的族称时,相应的民族形象便会把某一民族的特征一并投射出来,实现了信息识别的人脑机能演绎。

形象的第三级次形塑。人脑对信息加工之后,会根据人的认知结构、所处环境、动机与需要构建出信息镜像,这些镜像是经过人的“主观在场”对信息加以截留、保存的形象,促进了特定文化镜像的生成。此阶段会发生物质形象的第三级次形塑。人脑通过过滤、吸纳、投射外部信息,把所有信息整合后使之成为有序的整体认识,从而形成新的形象表达。比如民族识别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从大量的传统民族或者民族支系中,通过特定的标准化指标加以识别。其结果就是使每一个民族集合为相对稳定的文化镜像,成为一种有助于民族事务治理的文化共同体,进而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亦丰富了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结构性、整体性特征。

形象的第四级次形塑。这一级次是形象生成的最高状态。因为在人类社会现实生活中,形象的建立最终都是在公共生活的基础上获得整体性特征的,实现了“公意”的表达。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性、制度性、国家性都明显地参与进来。尤其是在“国家在场”的情景下,需要纳入适宜国情发展的核心价值,使所有的形象通过具有表征性作用的文化符号系统得以传输、表达出来,形成有利于凝聚国民意识的政治文化象征。这是形象建立的最高级次,符合国家顶层设计的需要,有助于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进程。当下进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正是要汇集中华民族凝聚性力量,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夯实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的理论根基。

以上形象的生成与四个变动级次中,第一、第二级次更多是依赖于特定主体意识的自循环表达,突出的是个体的主观性与物质的客观性之间的自然连接。到第三个级次,就逐渐伴随着明显的社会性与政治性,逐渐扩大为集体意识的主观参与。最后一个级次是形象生成的最高状态,即由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参与,在民族形象构建中注入了强大的“国家”身份,形成了一种能代表国家的民族形象。总之,形象的形成在物质运动、信息传输、人脑机能、心理图式等环节中实现了不断的循环过程,凸显了形象的动态发展机制,同时也彰显了形象可能静止于某一主观环节、某一时间节点。因此在形象的完整性意义建构中,每一环节的形象生成因素都不可忽视。沿着这种理论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也是一个兼容主观与客观、空间与时间、话语与实践等诸多因素的并联式或者多层次叠加的生成过程。

(三)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基本要素

由上述形象理论及其生成转化理论模型分析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同样面临着相关的信息编码、传输、加工、图式等运动变化过程。其中涉及复杂的客观因素介入与主观因素的不断互动,面临着多层次动态变迁与内容重构的挑战。因为每一历史阶段的人们在秉承历史遗存的文化符号的同时,又会基于当时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活需要,对文化符号的表现形式进行加工改造,并对之进行适宜主流价值形态的重新赋意与诠释,故而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都处于动态平衡模式之中。据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要重点关注四个重要的组成要素。

一是信息源,即需要表达的事物本身。集中体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原生构成要素。中华

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经过数千年的中华文明浸润,在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这样的民族结构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源,涉及不同的血缘、族系、语言、文化、居住空间、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丰富的原生要素。从历时性来看,这些信息源可以是各民族丰富的历史遗存,包括各自的历史文化记忆、文化遗产等;从共时性来看,这些信息源可以是当下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民族文化元素,蕴含着时代精神的阐释。这些信息源有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文化要素。

二是形象指向的客体,即中华民族共同体。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各组成要素、内在结构、关联机制等。从结构上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既包括我国今天的56个民族,也包括我国历史上存在过的族群”^{[24]4}。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我国历史与现实多民族交流、互动、交融中形成的紧密关系模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中要关照到“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以民族文化的“多元”丰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内容,以政治体系的“一体”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政治制度基础。“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属性,二者缺一不可,共同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既鲜活又稳固。

三是阐释者,即形象阐释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政府、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等。从顶层设计来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必须唱响的主旋律。从运行主体来看,各级政府必须紧跟党中央的精神,结合地方特色与实际,有形、有感、有效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推进。从专家学者角度来讲,不仅要加大深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础理论研究,而且要积极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性语言向学术化、生活化语言转化,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会化、生活化。从新闻媒体角度来说,要以生动性、丰富性、鲜活性的素材和案例加大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内容的传播,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话语优势。

四是形象建构需要达成目标共识,即生成表达性、规范性作用的概念与话语。形象建设最终要赋予形象完整性意义,在思想观念中发挥着集中性、统领性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中,其话语规范要以“四个共同”为历史基础、以“五个突出特性”为文明根据、以“四个与共”为价值引领、以“五观”为思想基础、以“四对关系”为重要方法、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目标。这些话语要贯穿、融通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时代话语之中。需要以这些规范用语为纲加大话语传播,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立体化,使其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思想统一性和价值引领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本身是一个具有覆盖性、系统性的概念,这四个要素彼此关联、相互依托,并且所有这些信息源、主客体、话语体系共同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符号生成与意义建构,汇聚成一种高度一致的逻辑关系模式及其实践运行方式。质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一个兼容中华多民族的客观实体,并且在不同的民族主体中不断经历大脑的主观投射与心理图式,在“历史场景”“国家意义”“文化化”“生活化”等多重信息覆盖与价值关联中形成的共同体形象,表现出多层次并不断动态发展的过程。由此,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信息源的科学追溯、对形象变迁内在机制的深入分析、对形象符号表达机制的正确运用、对适宜主流思想的整体性意义建构,都应该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基本问题。

三、符号标识: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外现的载体依赖

形象与文化符号是一组紧密相关的命题,对形象的认知离不开文化符号的标识性作用。“符号与其说是表达意义,不如说是赋予我们生成意义的能力。”^[25] 形象生成的关键源自文化符号展示,形象是文化符号意指功能与话语表意的自然结果。从形象的生成转化机制来看,形象在由第一级次向第二级次发展的过程中,涉及初始信息的输出、加工与整理,此时的信息源变得十分重要。因此,需借助历史记忆符号来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源得以有效汇聚。形象在由第二级次向第三级次发展中涉及文化镜像的生成,此时需通过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来形塑、具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体。形象在由第三级次向第四级次发展中,涉及政治话语体系的生成,这时有必要依托语言文字符号来有效传达、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意(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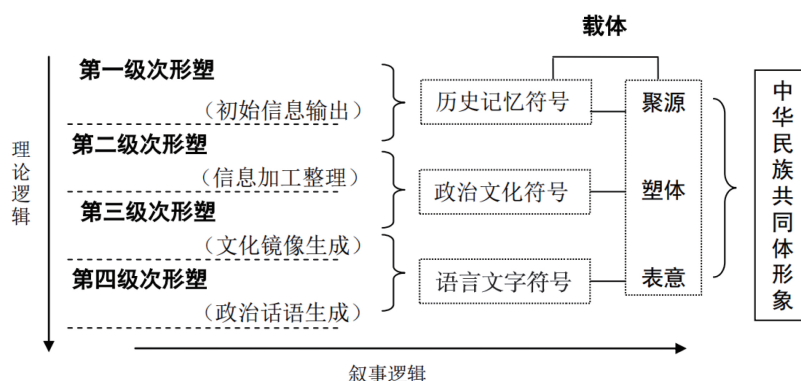


图2 形象理论模型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标识结构图

(一) 依据历史记忆符号汇聚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源

历史记忆符号之所以能表征历史文化的共同性意义,是因为其能通过心理的映射赋予共同体共同性特征,对文化起到表征作用。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来看,共同体兼具以血缘关系为特征的自然属性和以个体与集体间的利益关联为纽带的社会属性。共同体建设需要依托历史记忆符号来凝聚共同的历史文化基因,发挥聚合性与象征性作用。石硕曾依据钱穆的“扩大”与“绵延”论提出,中国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聚合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扩大”是由相对独立自存的“多元”走向“多元一体”,这是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绵延”则是指中国的文化、民族与疆域数千年来一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为世界历史所罕见^[26]。中华各族人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了丰富而又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记忆并通过特定的文化符号体现出来。比如各民族服饰、习俗、图腾、特色餐饮、人文景观、器具造型等,这些都可以具体的文化符号呈现出来。同时,各民族之间也形成了具有共享性的民族文化符号,比如春节、中秋节等节日文化符号;长城、长江、黄河、故宫等地标性文化符号;唐诗、宋词、元曲、水墨画等文学艺术类文化符号。正是这些文化符号共同熔铸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基础。

值得强调的是,历史文化只有被认同才会发挥出实践赋能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构成,是由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将多元的生活意义凝练为共享的文化符号体系和共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需有效兼顾各族人民共创共享的历史文化记忆,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源认识和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内

在结构,把各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丰厚文化呈现在共享共融的“大花园”里。因此,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加以符号化,不断挖掘、阐释、汇聚出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力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 依存政治文化符号具象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体

政治文化是一个国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遗产、政治制度安排、社会经济关系结构中共同塑造的一种文化模式,其中镶嵌着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与行动取向。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足以证明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想象的共同体,而是基于厚重的政治文化基础上长期交往交流交融而成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不断交往、接触和融合中自然形成的,具有“多元一体格局”的事实共同体^[27]。那么,这种“事实共同体”要如何被更广泛、更深入、更有效地认知,则需要对其进行系统的具象化工作。

具象化是物质形象被认知的必要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具象化依赖于政治文化符号的表征作用,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实体的直观感知。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28]⁷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代表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象,有必要从国家层面树立和突出国旗、国歌、国徽、地图等物化形态的政治象征,以表达国家层面的共同体意义;另一方面,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各民族长期以来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体,有必要以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气质风貌、形象特征等作为依托,发挥这些文化符号在塑造共同体认同中的纽带作用。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需要通过特定的政治文化符号立体呈现出来。当下,我国民族理论与政策中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大花园”“石榴籽”“一家亲”等理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正是通过这些具象化的符号促进各民族把个体情感与家国情怀有效联结起来,形成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三) 依托语言文字符号传播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意

语言文字符号是对文化系统内部结构及其内在意义的信息传递。人类正是凭借语言文字,才能够思维、记忆、想象,才能最终完成某种经验或往事的构造^[29]²⁰。在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文字符号使客观存在的世界变成可以被理解与认识的世界。在人类发展的不同阶段,人类生存的印记正是依赖于语言文字符号,使某一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独具特色与象征意义的文化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之意离不开中华民族特有的语言文字符号,比如通过特定的语言文字符号表达并传播中华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因此,树立与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需要通过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符号加以凸显与传播。

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形象建设要突破传统观念的界限,不仅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记忆的视觉再现,也要通过语言文字符号进行书写,加强相应的传播机制。一方面,要对大众广为接受的国家象征标识、建筑标识、地理标识、民俗标识、中华民族精神标识等进行广泛深入的传播。“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打造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现代表现方式,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价值,形成一大批认同度高、传播力强、具有象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的符号和标识。”^[30]另一方面,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丰富社会、文化、传媒等教育载体,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纳入党员干部教育、国民教育体系中,有形、有感、有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进一步凝聚国民共识夯实思想教育根基。

四、意义建构: 整体性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多维互构

形象不管在多重因素中经历怎样的级次变迁,始终依赖于语言、词汇的意义表达,形象建设离不开话语体系建构。也就是说,形象建设并不是价值无涉的,不仅要关注形象表征什么,更要关注形象意旨什么。“形象和主体的价值诉求深陷于一个相互生成的循环,不可分割。”^{[31]61} 中华大地上基于特定区域、特定民族形成了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不同民族文化之间虽然有着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但也可能会形成封闭的圈层文化。由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不能从单一的历史文化片段或者某一形象空间生成的横切面出发,而应坚持系统论的方法。需要兼顾历史性与现代性、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融通共同性与差异性、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范畴,从而实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完整性意义建构。

(一) 兼顾历史性与现代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塑造需要依托中华文化符号的标识与象征,而中华文化符号的生成离不开中华各民族共同经历、共同创造的历史生活。比如各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和亲通婚、移民迁徙、茶马互市、怀柔教化等交往交流交融中孕育了广泛的文化认同,谱写了诸如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进藏、凉州会盟、瓦氏夫人抗倭、土尔扈特万里东归等历史佳话,这些历史故事滋养的中华民族精神无疑是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宝贵资源。然而,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字的普及程度较低,历史事实被记载、传播的范围较小,甚至在现代化的话语传播中这些经典的历史文化故事未必被有效挖掘并被大众广泛认知。有必要沉入历史深处,“打捞”那些被湮没在文物和历史遗迹的历史文化记忆,并对之进行发掘、拣选、再诠释和再表达,共同铸就适宜中华民族心理习惯与现代化发展需要的精神文化符号。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32]161} 这无疑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中需要大力完成的文化工程。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实践中,应始终用动态的眼光兼顾中华文化的历史性与现代性。有必要在增进文化自信的语境中重新赋予传统文化新的内涵,以促进文化传承与实践赋能的价值统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效融合起来,对其进行加工和重塑。故而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丝路精神、探月精神等都应该进行有效萃取,使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总而言之,各民族之间的优秀文化符号正是通过交往交流交融存续至今,现代化使这些文化愈加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交融态势,文化符号的共享性和共同性趋势增强,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的客观基础。

(二) 统一物质性与精神性

形象是人类认知思维、心智选择、情感表达、经验和意义阐释的集合体,兼容事物的内涵与外延。从形象的生成过程来看,形象蕴含着事物本源性与外部建构性的统一。在现实生活中,形象往往被视为与意识、观念相统一的主观事物。马克思曾指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33]112} 在实际运作中,观念、意识、形象并不是物质世界与主观世界的直接对应物。也就是说,由于主体的意象思维与情感各异,同一客观事物在不同的主体中生成不同的映像。因此,追求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便成为形象建设需要面对的具体问题。

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中华民族在实践中创造、赋意和传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本质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存在方式和发展规律,在民族记忆建构、情感共识凝聚、文化认同强化中发挥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在实际运作中,有必要通过描述中华民族史中的传奇人物经历、民族团结故事等,有效萃取中华民族苦难兴衰史中的积极乐观、团结友爱、英勇奋进的精神意象,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历史文化基因与精神密码。当下,应该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不断编码与再构,使之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生成的新沃土。简言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不仅要在历史文化中传承,而且要在精神生产和物质发展的实践中不断生长。

(三) 融通共同性与差异性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结构。“多元”意味着存在差异性,“一体”代表着共同性。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多元”与“一体”的有机统一。“有同无异,没必要强调共同体;有异无同,形成不了共同体。”^[34] 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自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必须阐释好的重要关系。各民族的差异性长期存在,差异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丰富、鲜活的元素,因而尊重和包容差异性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重要基础。“共同性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基本属性。”^[35] 共同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提供包容性与动力,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实现完整性意义建构的本质所在。只有以增进共同性为主导、为方向,才能充分挖掘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质,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不偏离轨道。

我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社会环境,都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重要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汇聚了各族人民在生活实践中所创造的活泼多样、五彩斑斓的文化表现形式,并在现代化发展中获得了新的内涵。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过程中,虽然各民族优秀文化符号具有不同的呈现形式,但在差异性中亦有共享性与共同性,呈现出文化“大花园”的景象。在历史记忆及其文化符号建构中,“倘若只局限于各民族自建历史记忆,形成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分散板块,对统一多民族国家建构终将是不利的”^[36]。因此,一方面要积极梳理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相似性元素和相通性价值,注意对各民族在风俗习惯、神话传说、饮食特色、建筑风格等方面的保护和传承,凸显各民族群众在共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要在各民族优秀文化中萃取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和共享的历史记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框架中进行新设计、再叙述与再表达,凸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的文化符号,进而有效阐释“根深干壮、枝繁叶茂”的理论逻辑,使差异性与共同性实现有效统一。

(四) 贯通民族性与世界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也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具有鲜明的民族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渐提高,中华文化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在全球化进程中难免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影响,中华文化的区域性特征、传统风格受到一定的挑战。当下,“从国际层面看,中国目前正处在民族复兴大业爬坡过坎的关键性阶段”^[37]。在对外交流与传播中,如何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权、树立与突出同我国综合国力相匹配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变得更为紧迫。从民族性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延续的是“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形象,展现的是各民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世界性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

以展示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为目标,在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而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是吸收人类现代文明成果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既发展中华民族自身又推动世界文化进步。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处于持续演进中,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需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一方面,必须秉持丰富的人文关怀与优秀传统品质,“将真实丰富立体化的民族形象呈现在世界面前,做好排除误解、正本清源的文化交流传播工作”^[38],确保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在传播中体现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遵循国际秩序和国际话语传播机制与规律,从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寻找各国民族文化的融通性,确定共同的价值目标,提升对外传播话语的亲和力,积极塑造话语认同。尤其是要灵活运用更具接纳性的话语范式,“在‘中国—西方’‘中华民族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多重关系维度上思考中华民族形象传播的策略,为新时代传播好中国声音、建构中华民族形象奠定基础”^[39],有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协同发展。

五、结语

形象是主观与客观共同作用的结果,形象建构是厘清各种关系图式分野、对人类所需的意义进行阐释的客观需要。形象因为具有多层级动态发展特征,在现实生活中又具有“表意性”价值功能,故而使人们对文化符号产生依赖。无论形象是理性的逻辑演绎还是感性的时空体验,文化符号的指称、命名与隐喻对形象都具有特定的象征与表意功能。按此逻辑,从文化符号建构维度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便成为一种理论可能。正如有学者强调“过去我们忽略了文化符号在其生产过程中存在动态性、场景性、过程性,缺乏整体性的认识。在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的过程中,需要注重不同的符号系统之间的合作。”^[40]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需要面对的一个事实是:从历时性来看,我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文化汇聚的巨型空间,不同的民族文化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发生碰撞、对话与交融,汇聚成具有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演绎着中华文明延续性的基本逻辑,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纽带作用;从共时性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需要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框架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符号进行阐释与分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架起互相尊重、彼此包容、和谐共生的文化纽带。因此,只有从系统论的方法出发,才能凸显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设的完整性意义。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9-09-28.
- [2]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学习辅导读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 [3] 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 共同建设伟大祖国 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N]. 人民日报, 2022-03-06.
- [4]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

- 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5] 徐欣顺.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的百年回眸与思考[J].贵州民族研究,2022(1):24-29.
- [6] 彭兆荣.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互视[J].民族艺术,2022(6):21-27.
- [7] 巴胜超.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三境“入眼悦耳”“身体力行”“无象入心”[J].民族艺术,2022(6):37-45.
- [8] 李春燕.缘起·价值·框架: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图像叙事的三维探赜[J].中州学刊,2023(11):169-176.
- [9] 石谷岩.新时代民族题材影视生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象建构[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3(3):40-47.
- [10] 田海林.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论析[J].广西民族研究,2022(5):29-36.
- [11] 孟凡行.中华民族视觉形象:周边概念考释与核心概念建构[J].贵州社会科学,2023(10):27-34.
- [12] 邓启耀.中华民族视觉形象的形成与文化认同[J].民族艺术,2021(6):16-28.
- [13] 曾明,龚婷,戴登云,等.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划定原则及类型特点[J].民族学刊,2021(7):1-8.
- [14] 夏云峰.树立和突出共享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三重逻辑[J].广西民族研究,2023(2):36-45.
- [15] 王光文,申一方.树立和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的地方实践机制[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34-44.
- [16] 吴艳东,张金玉.从连环画到网络图文:图像视域中的意识形态具象化建构[J].探索,2023(3):176-188.
- [17] 李春燕.中国共产党建构中华民族形象的历史经验[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0):20-28.
- [18] 韩强.论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百年建构[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6):16-28.
- [19] 汤姆·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 [20]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21] 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22] 乌蒙勃托·艾柯.符号学理论[M].卢德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
- [2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4]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编写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25] COHEN A. The symbolic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M]. London: Routledge, 1985.
- [26] 石硕.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1):87-101.
- [27] 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3-21.
- [28]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 [29]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刘大基,傅志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 [30] 闵言平.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J].中国民族,2021(3):21.
- [31] 汤姆·米歇尔.图像何求:形象的生命与爱[M].陈永国,高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 [3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4] 尤权.做好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科学指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J].求是,2021(21):42-49.
- [35] 龙金菊.各民族全方位嵌入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逻辑理路——基于共同体秩序的分析视角[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7):42-50.
- [36] 龙金菊.论高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生成机制[J].民族教育研究,2023(3):80-88.
- [37] 严庆,王跃.历史政治学视域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J].探索,2022(5):79-95.
- [38] 青觉,徐欣顺.论中华文化符号的概念、要素与边界[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05-112.
- [39] 李春燕,陶喜红.新时代中华民族形象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进路[J].江汉论坛,2023(2):37-44.
- [40] 方李莉.突出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N].中国民族报,2022-10-11.

Theoretical Foundation, Symbol Identification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mage

LONG Jinju

(Research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ongren College, Tongren 554300, China)

Abstract: The image itself is an extremely complex internal system,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effective interaction a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accompanied by a clos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human and object” in the externalization process. Image analysis is an objective necessity for elucidating various relational schemas and explicating the meanings humans seek. Through examination, research on images is primarily manifested in three theoretical orientations, such as the theory of image as representation, the theory of image as symbol, and the theory of image as ideology. All these theories emphasize that an image is a dynamic generative process, the result of a joint action between the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realms. Based on the generation process of images and their multi-leve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combined with the review and sorting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t is found that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s also undergoing a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multi-level and continuous interaction and meaning associ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generation mechanism, symbolic markers, and meaning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from the theoretical pedigree of image research. It can form a strong explana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lay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onsolidating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n the specific construction and narrative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nverge the source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based on historical memory symbols, rely o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symbols to visualize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rely on language and thinking symbols to disseminate the meaning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Moreover,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historicity and modernity, unite materiality and spirituality, integrate commonality and difference, and connect nationality and universality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to promote the multi-dimensional interac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This will play an a significant role in enhancing the national image, fostering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and boosting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image of the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cultural symbols

责任编辑: 赵 超